



英国人进入卫藏考察活动的 阶段性特点及成因(1840—1875)

肖萍 向玉成

摘要:1840—1875年,外国人开始进入卫藏地区进行考察与情报活动,其中英国人进入卫藏考察活动的成效最为显著。英国人进入卫藏考察和从事情报活动主要通过藏西、藏南两个方向及“班智达”群体进行,而法、普鲁士、俄等国由康区或藏北进入卫藏考察活动却因当地官员和藏人的阻止而作罢,俄国探险考察家由藏北进入卫藏的考察更是迟至19世纪70年代才开启,唯独英国人进入卫藏考察活动取得了“独占鳌头”地位和其他西方国家及其他方法难以企及的效果。英国人之所以能够取得“独占鳌头”的成绩,原因在于英国拥有藏南、藏西两个进入卫藏的“前进基地”以及利用印度测量局培养了一批精于测绘、具有超常耐力、不惧生死、甘为其利用的名为“班智达”的英印间谍型探险家。

关键词:卫藏考察;英国人;1840—1875年

DOI: 10.13734/j.cnki.1000-5315.2021.03.019

收稿日期:2020-10-12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英美涉藏档案文献整理与研究”(18ZDA192)、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近代外国人在卫藏游历考察研究”(15XZS00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肖萍,女,重庆璧山人,四川旅游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E-mail: 1269337910@qq.com;

向玉成,男,四川南部人,历史学博士,四川旅游学院旅游文化产业学院教授,四川师范大学四川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近现代西南区域政治与社会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据笔者考察统计,1840—1951年进入中国卫藏^①活动的外国人总数为859人(其中英国人404人,占总数的47.03%)^②,并且其活动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点。以“马嘉里事件”和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为标志,晚清外国人进入卫藏活动明显可以分成前后两个阶段,而1911年辛亥革命导致清王朝覆灭亦为一重大历史节点,故近代外国人进入卫藏活动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840—1875)49人,第二阶段(1876—1911)400人,第三阶段(1912—1951)410人。至于学术界对近代英国人进入卫藏游历考察活动的研究,此前更多集中于重要人物、重要群体(如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相关事件以及英国考察者的相关著述等方面,而对其考察活动各阶段的史实梳理及其阶段性特点尚未见专文探讨,故本文拟就第一阶段即1840—1875年英国人进入卫藏考察活动的特点及其成因加以探讨。

一 外国人进入卫藏考察活动的基本情况特点

为便于叙述与分析,笔者先将1840—1875年外国人进入卫藏活动概况列如表1、表2。

^①本文所论的“卫藏”,包括前后藏、阿里、羌塘,即除开按三大方言区划分的康区与安多之外的西藏各地(包括藏东南雅鲁藏布江大峡谷一带)。
^②以外国人首次进入卫藏时间为准进行统计,未计重复进出卫藏人次及出离卫藏时间等因素,因此,前一阶段进入卫藏者下一阶段仍留在卫藏的情况未作统计,文中的统计比例仅反映各阶段外国人进入卫藏人数的动态变化情况。

表1 1840—1875年外国人进入卫藏活动情况简表

时 间	项 目	国籍、身份、姓名、生卒年等史实	主要活动地域、线路、成果、影响等
1845—1846		法国传教士古伯察(Huc, Evariste-Regis, 1813—1860, 又译胡克、额涅里斯塔)、秦噶咩(Gabet Joseph, 1808—1853, 又译噶咩约则)。	1845年经玉树的曲麻莱和治多潜入拉萨, 次年被清廷押解经察木多(昌都)、巴塘、打箭炉(康定)回川至粤, 其著作《鞑鞑西藏旅行记》影响甚大。
1845—1848		1840年代, 在藏西活动过的英国人有理查德·斯特雷奇(Richard Strachey)和亨利·斯特雷奇(Henry Strachey, 又译斯特拉彻、斯特拉契、斯特里奇)兄弟、J·E·温特伯特姆、亚历山大·坎宁安(A. Cunningham, 又译坎宁汉、库宁汉)、汤姆逊(T. Thomson)。	为英国积累了大量的西藏阿里西部地区的地形学知识, 发现了喀喇昆仑山的塞钦河, 开始从事非法划界工作, 亨利·斯特雷奇获英皇家地理学会金奖, 并出版《西部西藏的自然地理》(<i>Physical Geography of Western Tibet</i>)一书, 绘制了一幅较为详细的藏西地图。
1848—1851		坎贝尔博士(A. Campbell, 又译坎柏尔, 负责管理设在大吉岭的山中避暑盛地)与约瑟夫·胡克(W. J. Hooker, 又译泽克、呼德尔、霍克)博士曾多次进入藏南考察。	胡克曾到达中国西藏绰拉姆湖、错姆哲林河谷、定结(Tingkey)县、岗巴县、亚东县一带, 著有《喜马拉雅山日记》。
1854—1858		在著名地理学家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和普鲁士国王支持下, 普鲁士人舒拉金威特(Schlagintweit)探险队三兄弟阿道夫(Adolph)、赫尔曼(Hermann)和罗伯特(Robert)进行了德国历史上首次喜马拉雅考察(藏西南、新疆喀什噶尔等地), 取得丰硕成果。1857年, 三兄弟取道吉利雅进入叶尔羌、喀什噶尔, 阿道夫被叛乱的倭里汉处死。	留有大量关于喜马拉雅和西藏的日记、手稿、草图、测量记录、照片和手绘图, 主要保存于巴伐利亚国家图书馆, 共达43卷。还带回1400种土壤样品和植物标本, 被沙皇授予“萨昆仑斯基”的头衔(意为“攀登过昆仑山的人”)。
1855后		1855—1880年在康区活动的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教士德格丹(Auguste Desgodins, 1826—1913, 又译奥古斯特·德什各丁斯、德格定、德告丹、戴思歌丁司、戴高丹、德斯古丁斯)多次谋求进入卫藏, 1880年5月离开打箭炉, 经过加尔各答和大吉岭, 定居亚东, 1898年赴香港, 77岁时又返回亚东, 1913年死于亚东。	德格丹一生中有关西藏的著述甚丰, 其论著、论文和词典共41种, 最重要者为《藏-拉-法语词典》和《1855—1870年的西藏传教区》, 至今仍为研究西藏史的重要文献。
1863		英国测绘师高德文·奥斯腾(Henry Haversham Godwin-Austen)。	曾到班公湖地区探察。
1864—1867		英印测绘局测量员约翰逊(W. H. Johansson)于1864—1865年对喀喇昆仑山口以北地区进行考察后, 经阿克赛钦回到印度, 1867年又前往喀喇喀什河、和阗等地区测绘, 曾远行到克里雅。	1867年约翰逊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杂志》上发表考察报告, 主张把阿克赛钦地区划进印度版图, 并将中印西段边界线划在喀喇昆仑山一侧, 所谓的“约翰逊线”出炉。
1865—1875		英印间谍南·辛格(Nain Singh)及其堂兄马尼·辛格(Mani Singh)等12人(印度10人、波斯1人、国籍不明者1人)受英印测量局派遣进入卫藏, 考察藏布江流域、日喀则、拉萨、托加隆、印度河源头等大片地区, 取得重要成果。	南·辛格为蒙哥马利(T. G. Montgomerie)主持印度测量局时训练的首批“班智达”入藏探险家中的贡献最大者, 被称为“一号班智达”。
1865.8		英国皇家燧发枪团上校阿迪拉·本尼特(Adrian Bennett)由一名向导引路, 经尼提关口(Niti Pass)到西藏达巴宗[Daba, 距离噶大克(Gartok)约100英里]游历。	阿迪拉·本尼特完成了《达巴游历要记》(Rough Notes of a Visit to Daba)一文。汤洛普(Dunlop)亦到过达巴宗, 著有《狩猎在喜马拉雅》(<i>Hunting in the Himalayas</i>)一书。
1866—1867		尼泊尔忠格·巴哈杜尔大邦(Maharaja Jung Bahadur)使节卡吉·嘉提·希尔(Kaji Jagat Sher)到北京朝觐并经成都、巴塘等地返回。	他在途经巴塘时与德格丹有交往及情报交流, 1867年古柏在成都和巴塘都遇见过他。
1969.7		英国人福赛斯(Forsyth)率领由罗伯特·沙敖(Robert Shaw, 又译罗伯特·肖, 荣赫鹏之舅父)、亨德森、米尔扎(Mirza Shuja)、雅库布罕和英国驻拉达克专员凯利(Cayley)等人组成的使团, 自拉达克出发, 经张承谟路到达沙都拉。	

1870—1871	查默尔上尉及印度地理勘测研究室的 W·T·布兰福德(W. T. Blanford)在伊尔威斯上尉的陪同下,沿胡克的足迹探索了蒂斯达河河谷上游、唐基亚山口及通向错姆折林河谷的几个山口。	布兰福德发现了地图上没有的 3 个湖泊,采集了不错的鸟类标本。
1871—1872	蒙哥马利(T. G. Montgamerie)派出考察队 5 人(一个年轻的 Semi-Tibetan 和 4 名助手)潜入日喀则、南木林、纳木错[Namcho, 又名 Tengri Nur Lake, 当地人称天湖(“Sky Lake”)]湖区、拉萨等地考察,后返回印度。	蒙哥马利的研究机构结合此次考察,以及霍奇森(Hodgson)和其他人的综合研究成果,基本能够勾画出从尼泊尔到卫藏中部的地理大势以及藏布江、羊卓雍湖、拉萨、纳木错以及其间的喜马拉雅山脉、念青唐古拉山脉及河流走向。
1872.11—1873.2	俄国探险家、军官普热瓦斯基(英文写为 Prjivalsky, 德文写为 Prjewalski, 译为普介凡、普里伐尔斯基、潘若伐斯基、普鲁捷维斯基、普尔热瓦斯基、蒲儿久瓦利斯基、波杰瓦利斯基、波奇瓦斯恩, 1839.3.31—1888.10.20)率考察队 4 人(包括普氏、副手米·亚·佩利佐夫及两个哥萨克人)进入卫藏。	后普氏又于 1878—1879、1884 年率武装考察队进入卫藏,普氏的目标始终是拉萨,虽然总是未能到达。
1873 后 (有说 1871)	俄国布里亚特蒙古族僧人德尔智(Dorjief, 又译多吉也夫、多吉耶夫)等进入卫藏活动多年,在中外关系史上影响甚大。	德尔智后来成为达赖侍读,进入卫藏权力中枢,引起英国的强烈反应,由此带来了大量“后遗症”。
1873.4 至年底	安德鲁·威尔逊(Andrew Wilson)从西姆拉出发,到中国卫藏札达县一带考察,目的主要为考察喜马拉雅山的自然地理及气候情况。	著有《雪原》(The Abode of Snow)一书。
1873.5	匈牙利人伯尔占茨(Berzency)自彼得堡出发,取道喀什噶尔、叶尔羌、沙都拉、喀喇昆仑山口到达列城,沿途进行探察活动。	
1873.7	英国上校托马斯·戈登(Thomas Gordon)、上尉楚特(Trotter, 又译特罗特)作为第二次福赛斯(Forsyth)使团成员,随团从列城到喀什噶尔,途中戈登到过藏西考察(欲到拉萨但未成功)。	戈登著有《世界屋脊》(The Roof of the World)一书;楚特返回时越过昆仑山经藏西回到列城,完成了三角测量任务,1878 年获英国皇家地理学会颁发的奖章。
1873、1875—1876	1873 年,埃德加(J. W. Edgar)考察了锡金与藏边交通;1875—1876 年间,拉勒往返于大吉岭与日喀则之间考察。	埃德加著有《锡金和西藏边界》(Sikkim and the Tibetan Frontier)一书。

表 2 1840—1875 年进入卫藏活动的外国人分类统计表

人数构成	总人数 49	男 49	女 0	姓名无考 2(俄)	被杀 1(普鲁士)	考察队 27 支				
国籍分布	8 国 49 人	英 19	印度 15	俄 5	法 3	普鲁士 3	尼泊尔 1	匈 1	波斯 1	国籍不明 1
身份分布	6 类 49 人	间谍 18	探险 11	官员 8	军人 5	科考 4			教士 3	

备注:对人物身份进行分类统计,只能是相对而言,因很多人都有多重身份,且涉及到对其评价问题,故值得深入分析和再审视。

从表 1、表 2 可以发现,1840—1875 年进入卫藏考察的外国人,其国籍分布的不平衡性十分明显,英印合计 34 人,占总人数的 69.39%。可以说,第一阶段主要是英印通过派人潜入或派遣“班智达”等手段向卫藏渗透,同时俄、法、普鲁士人等也有进入卫藏活动的图谋。

在近代外国人进入卫藏活动史上,有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值得关注。在第一阶段,即 1840—1875 年间,英国人率先在藏西、藏南两个方向同时行动(先是藏西划界、藏南建前进基地,效果不佳之后开始使用“班智达”潜入),并率先在藏南方向建立前进基地和据点,派出“班智达”潜入日喀则等地活动。法国人虽然及早动手,但 1846 年古伯察和秦神父被押解出卫藏后,其主要战略转为先图谋康区,此后法国谋求从东面进入卫藏的

企图亦未能实现^①,故法国在近代对卫藏的图谋几乎无所作为。而忙于国内及欧洲事务的俄国,直到19世纪70年代才开始直接派人从藏北进入卫藏,主要派遣有自普热瓦尔斯基考察队开始的数支俄国考察队以及1873年前后进入拉萨哲蚌寺郭芒扎仓修习并在卫藏活动多年的阿旺·洛桑·德尔智。其他国家进入卫藏活动者,大致有普鲁士3人(舒拉金威特兄弟)、尼泊尔1人、匈牙利1人、波斯1人^②、国籍不明者1人。其中普鲁士人在1854—1858年组织了舒拉金威特探险队,进行了德国历史上首次喜马拉雅考察(藏西南、新疆喀什噶尔等地),在1857年取道吉利雅进入叶尔羌、喀什噶尔途中,探险队三兄弟中的阿道夫·舒拉金威特被叛乱的倭里汉处死^③。概言之,在第一阶段,英国人在进入卫藏考察活动中处于“独占鳌头”的地位。

19世纪四五十年代,英国人进入卫藏考察主要是自己动手。40年代,到卫藏活动过的英国人,主要有理查德·斯特雷奇和亨利·斯特雷奇兄弟、J·E·温特伯特姆、亚历山大·坎宁安^④、汤姆逊、坎贝尔、胡克博士等人,其中在藏西方向活动的主要有理查德·斯特雷奇和亨利·斯特雷奇兄弟、J·E·温特伯特姆、亚历山大·坎宁安、汤姆逊等人,在藏南方向活动的主要有坎贝尔和胡克博士等人。至60年代后,英国主要通过培养“班智达”并派其伪装潜入的手段来达到进入卫藏活动和考察的目的。

要之,在第一阶段外国人进入卫藏考察活动中,英国人占绝对优势。其考察内容,主要是地理科考和情报收集。其进入卫藏地区的方向和线路,主要是藏南、藏西两路,即从其两个前进基地大吉岭—亚东北上和从拉达克进入藏西阿里地区,矛头直指卫藏腹地,但均很难成功穿越到达拉萨。其参与考察的人员,先主要是直接派英国人潜入,后主要是通过训练“班智达”并派其伪装潜入。

二 藏西方向的考察活动

19世纪40年代,英国控制了印度及道格拉王国后,拉达克地区(首府列城)逐渐成为其从藏西进入卫藏考察的一个“前进基地”。

1845年前后,亨利·斯特雷奇与理查德·斯特雷奇兄弟均在拉达克地区军界任职。隶属于孟加拉地方兵团第66军团的亨利·斯特雷奇中尉,或许是跟随摩尔克罗夫特对西藏西部进行探险的最著名的一名英国军官。摩尔克罗夫特因为在河床干涸的干旱期抵达玛法木错与兰嘎错(今译玛旁雍错与拉昂错)两湖,所以错误地认为兰嘎错是萨特累季河的真正源头。而亨利·斯特雷奇则认为,在大部分时间里,两湖的水位升高,可以形成在两湖间流淌的河,因为他曾亲眼目睹了“一条一百英尺宽,三英尺深的河流从东向西迅速地穿过了业已确定范围的河床”。1845年,在J·E·温特伯特姆的陪同下,理查德·斯特雷奇前去解决在玛法木错与兰嘎错之间是否有一条水路这一在其兄弟与摩尔克罗夫特之间的地形学争端。经他考察,确证了他兄弟亨利·斯特雷奇中尉的发现是正确的,从而纠正了摩尔克罗夫特的错误。亨利·斯特雷奇还同旁遮普(Punjab)喜马拉雅特别官员亚历山大·坎宁安少校密切合作,视察了英国控制区域查漠(Jammu)与道格拉头人古拉卜·辛格(Gulab Singh)统治区之间的边界。正是在这些探险中,亨利·斯特雷奇在喀喇昆仑山中发现了塞钦河(Siachen)。除此之外,他对积累大量的地形学资料做出了极有价值的贡献,印度测量局的克什米尔分部就以此为依据^⑤。在1847年森巴战争(英锡战争)之后,英国扶植锡克封臣古拉卜·辛格,建立了由英国保护的查漠与克什米尔王国,英印总督哈定委派亚历山大·坎宁安少校、亨利·斯特雷奇中尉和汤

①如表1所列1855年后法德格丹的活动,可为例证之一。

②1868年出道的波斯银匠米尔扎(即Mirza Shuja,官方文献中称为“The Minza”)受蒙哥马利训练和派遣,从巴达克山出发,经由喀什噶尔、叶尔羌等地,沿途进行测量考察,主要在帕米尔高原、克什米尔和中国新疆边境及喀什噶尔等地活动。见:魏长洪、何汉民编《外国探险家西域游记》,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年版,第338页。

③详见:赵光锐《西方有关德国涉藏历史的研究述评》,《民族研究》2012年第3期,第113页。

④亚历山大·坎宁安,与曾任印度外交大臣的威廉·坎宁安爵士(Sir William Cunningham)并非同一人。

⑤约翰·麦格雷格《西藏探险》,向红笏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22—223页。

姆逊^①三人组成划界委员会,他们进入阿里西部地区,从事非法的边界划定工作^②。后来成为印度测量局首批“班智达”成员的马尼·辛格与其堂兄弟南·辛格,在此次行动中被聘为翻译,这为几年后开始的英印“班智达”大规模入藏计划打下了基础。19世纪60年代以后,英国完全控制印度,并将其势力深入到锡金、不丹和尼泊尔等南亚小国,英国殖民当局还培养了一批印度测量局的“班智达”测量者,派他们潜入西藏阿里地区进行地理考察和情报活动,绘出了大量较为详细的阿里地图,掀起了阿里地理考察的小高潮^③。到清朝末年,外国人对阿里自然地理知识的掌握程度已经超越清廷。

1852年,亨利·斯特雷奇获得了英国皇家地理学会金质奖章(贡献奖)^④,并于1854年在伦敦出版了《西部西藏的自然地理》一书。由于该书难以获取,笔者从学界的研究中了解到该书的一些内容和情况。据黄博研究,该书是作者运用近代地理学知识对阿里及西部西藏的山川湖泊进行实地调查的调查报告。该书作者对阿里地区的三条大河都有较清楚的认识,认为当却藏布(Tachok Tsangspo)即马泉河(Horse River),是构成雅鲁藏布江上游的主干,森格藏布(Senge Tsangspo)即狮泉河(Lion River),可以肯定就是印度河的主源,而朗钦藏布(Langchen Tsangspo)就是有名的象泉河(Elephant River);该书作者还认为,班公湖(Pangong)是这一地区所有湖泊中最大的,湖盆呈西北—东南走向,全长110英里,面积达6500英里;该书作者还发现,班公湖是一个大盐湖。亨利·斯特雷奇的考察报告,提供了阿里地区自然地理的详细情况和大量数据,较之清朝政府概念性的阿里地理知识有了实质性的进步^⑤。另据列昂节夫的研究成果,亨利·斯特雷奇通过考察,还制成了一幅包括藏西大部分地区在内的地图^⑥。此外,亨利·斯特雷奇与汤姆逊还曾奉英印政府之命,从西姆拉出发前往叶尔羌、和阗等地考察,探察了帕郎河、努布拉和喀喇昆仑山,搜集了很多很有价值的植物标本^⑦。

对于英国所谓的地理勘测与划界的实质,亨利·斯特雷奇在其撰文中承认,香扎、拉不底地区本属于西藏,但他在制图时却故意篡改传统习惯边界线,把边界推至这一地区以北的分水岭上。房建昌先生曾引证亨利·斯特雷奇的话——“在这部分将会看到,我使英国的疆界把以往测量者所没有勘探过或忽略了的许多地方包括了进去;拉不底谷地对阿里方面来说要比对爪尔或帕因康达开阔和容易进入得多,这样,说它不属于拉萨似乎是值得怀疑的。但我却抓住它的水流入帕因康达这点来确定它在边界地图上的位置,以便英国的边界推进到波尔奇山山脊和通往沙尔沙尔的低的山口”——之后指出:“这段记载毫不掩饰地说明了英国的官员和‘探险家’如何任意篡改中印传统习惯线,把中国的领土划入印度。”^⑧

对于藏西“划界”问题,英国高度重视,多次派人非法潜入。据记载,1863年,英国测绘师高德文·奥斯腾曾到卫藏班公湖地区探察^⑨。1865年8月,英国皇家燧发枪团上校阿迪拉·本尼特由一名向导引路,经尼提关口到达卫藏达巴宗考察,沿途狩猎,在卫藏境内逗留了一个月,后返回印度西姆拉,并且撰文对沿途景观、动植物、民风民俗作了描述,对于所经历山口及达巴宗气候严寒、风大、无雪(虽然克什米尔地区地势低的很多地方都有雪,但沿途所经海拔四五千米以上的山口反而无雪)等情况作了较详细的记载。作者说,达巴宗距离噶大克(Gartok)约100英里,距离萨特累季河(Sutlej)即象泉河9—10英里,是当时西藏唯一对欧洲

① 汤姆逊著有 *Travels in Western Himalaya and Tibet etc. in 1847—1848* (London, 1852) 一书,对阿里及其以西地带的交通路线情况记载较多。参见:柳陞祺《拉萨旧事(1944—1949)》,中国藏学出版社2014年第2版,第112页。另外,汤姆逊 *Western Himalayas and Tibet: A Narrative on Ladakh and Mountains Northern India* (New Delhi: Cosmo Pub., 1987), 共501页,疑为上书再版。

② 详参:周伟洲《19世纪前后西藏与拉达克的关系及划界问题》,《中国藏学》1991年第1期,第65页。

③ 房建昌《清代西藏行政区划及历史地图》,《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3年第2期,第72页。

④ 妥超群《汉藏交界地带的徘徊者——近现代在安多(Amdo)的西方人及其旅行书写》,兰州大学2012年博士学位论文,第34—35页。

⑤ 黄博《清代中西西藏阿里的自然地理知识初探》,《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0年第25卷第3期,第70页。

⑥ 列昂节夫《外国在西藏的扩张(1888—1919)》,张方廉译,民族出版社1959年版,第15页。

⑦ 魏长洪、何汉民编《外国探险家西域游记》,第336页。

⑧ 参见:Strachey, “Note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ap of the British Himalayan frontier in Kumaon and Garhwal,” *Journal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 11, no. 4 (1848); 房建昌《近代中印中段边界史初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8年第1期,第87页。

⑨ Sven Hedin, “Discoveries in Southern Tibet,” *Geographical Journal* 33, no. 4 (April 1909): 415-416.

人开放的地方,西藏的汉官对此地管理很严格;作者在文中还提到,汤洛普亦到过达巴宗^①。

1864—1865年,英印测绘局官员约翰逊对喀喇昆仑山口以北地区进行考察后,经阿克赛钦回到印度。1867年,约翰逊从列城出发,前往喀喇喀什河、和阗等地区测绘,他还曾远行到克里雅,返回时取道桑珠到沙都拉,他用平面测量仪沿途进行测量,返回时带回了许多有价值的地理资料^②。1867年,约翰逊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杂志》上发表考察报告,主张把阿克赛钦地区划进印度版图,并将中印西段边界线划在喀喇昆仑山一侧,此即所谓的“约翰逊线”。但是,“约翰逊线”也遭到部分英国人的反对。如1868—1869年考察过新疆的罗伯特·沙敖,曾在其著作中指出:“我们近来出版的地图……却把并不属于他(笔者按:指英属印度)的那块地方划入了他的疆域之内,而这地方的全部居民都是另一个国家的臣民。”^③英国著名学者兰姆(Alastair Lamb)也认为:“W·H·约翰逊在1864年和1865年的作品和所标出的边界显然是荒谬的。”^④1892年,清政府派出官员踏勘了新疆南部边界,并在喀喇昆仑山山口树立了界碑。显然,英国人并没有把擅自划定的中印边界西段线“约翰逊线”告知清政府,历代中国政府更谈不上承认所谓的“约翰逊线”^⑤。

1869年7月,英国人福赛斯率领使团自拉达克出发,经张承谟路到达沙都拉,使团成员有罗伯特·沙敖、亨德森、米尔扎、雅库布罕和英国驻拉达克专员凯利等人。1873年7月,福赛斯又率领一支由131人组成的使团前往喀什噶尔,他们从列城出发,途经沙塞尔山口、沙都拉、叶尔羌、克孜勒到达喀什噶尔,沿途进行考察测量,带回去大量地理资料。这是英国对列城到喀什噶尔探察最为成功的一次,使团各成员都发表了探险经历和观察报告。这两次大规模使团中有不少人对藏西进行了考察。其中,凯利曾于1868年到过帕米尔高原和喀喇喀什河等地进行考察,1869年加入福赛斯使团,但他走到张承谟路后就与该使团分手,之后他经由喀喇喀什河南部去到该河上游,最后到达克孜勒峡。1873年7月,罗伯特·沙敖随第二次福赛斯使团从列城出发,取道喀喇昆仑山、苏格特、桑珠、哈尔噶里克到达叶尔羌和喀什噶尔,对喀喇昆仑山及其南北两麓进行了考察,著有《鞑靼高地、叶尔羌、喀什噶尔(原中国的鞑靼)游记——以及翻越喀喇昆仑山口的回程》一书,因此获得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的奖章;比达尔夫上尉从列城启程之后,则带领了一支测量队前往阿克苏、克孜勒、叶尔羌河等地探测;楚特上尉随第二次福赛斯使团考察的主要任务是地理测量,他曾派出一名当地人前往索尔哈克金矿,在返回时他又越过喀喇昆仑山经西藏、诺城回到列城,从而完成了三角测量任务,并于1878年获皇家地理学会颁发的奖章^⑥。此外,戈登上校作为第二次福赛斯使团的成员,随团从列城出发,并中途离团潜入藏西考察,企图到拉萨,但未成功,著有《世界屋脊》(*The Roof of the World*)一书^⑦。

三 藏南方向的考察活动

19世纪40年代,英国在藏南建立前进基地后,不断派人到通往西藏的一些山口进行探索。在40年代末至70年代期间,从南线进入卫藏的英国人,主要有胡克、坎贝尔、查默尔、布兰福德、伊尔威斯、安德鲁·威尔逊、埃德加、拉勒等人。

据记载,1848年,刚从南极探险归来的青年自然科学家约瑟夫·胡克博士,到印度拜访布莱恩·霍奇森^⑧。他们两个人在一起度过了数周的光阴,共同采集植物标本和比较他们的日记。他们还计划赴西藏从

① Adrian Bennett, "Rough notes of a visit to daba in Tibet, in August, 1865," *Proceeding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London* 10, no. 4 (1865—1866): 165-169.

② 魏长洪、何汉民编《外国探险家西域游记》,第337页

③ Rober Shaw, *Visits to High Tartary, Yarkand and Kashgar*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107. 转引自:张世均《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英国构建“印度安全”战略与中印边界争端问题的源起》,《思想战线》2015年第1期,第126页。

④ 转引自:阿拉斯泰尔·蓝姆《中印边境》,民通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66年版,第43—44页。又见:周卫平《百年中印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20页。

⑤ 张世均《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英国构建“印度安全”战略与中印边界争端问题的源起》,《思想战线》2015年第1期,第125—126页。

⑥ 魏长洪、何汉民编《外国探险家西域游记》,第338—340页。

⑦ Francis Younghusband, "Geographical Results of the Tibet Mission," *Geographical Journal* 25, no. 5 (May 1905): 494.

⑧ 布莱恩·霍奇森(B. Hodgson)生于1800年,16岁时在伦敦受雇于东印度公司,作为科室人员两年后被派往尼泊尔,1820年成为首任常驻加德满都外交代表的秘书,并于1833年被任命为常驻外交代表。霍奇森从1816年开始前后共在尼泊尔居住了25年,他热衷于收藏和生物采集,1843年返回英国并结婚,1844年再返回喜马拉雅山地区,在大吉岭附近又居住了14年,1858年返回英国。

事一次探险,以便从那里带回动植物标本。但由于霍奇森病倒,胡克只好与坎贝尔一起出发对锡金一带的喜马拉雅山麓进行了考察,他们只进入到离西藏边界不远的地方,未到达雅鲁藏布江以北的地区。胡克在其后的一部经典性著作《喜马拉雅山日记》中对此作了叙述^①。1849年11月13日,胡克在写给其父威廉·胡克(William J. Hooke)的一封信名为《拉冲河,西藏边境》(“Lachong River, Thibet Frontier”)的信中,说自己打算翻越“喜马拉雅东部的冬卡拉”(the Donkiah Lah, in the East Himalayan Chain)^②。胡克曾到达中国西藏绰拉姆湖、错姆哲林河谷、定结(Tingkey)县、岗巴县、亚东县一带^③。1848—1851年间,胡克侦察了哲孟雄与西藏交界的喜马拉雅山一带的地形、道路等,并绘制了详细的地图。他是第一个记述从印度到西藏拉萨最近的通道——春丕(Chumbi)地区的英国间谍^④。

此后至60年代中期,英国人的主要精力放在藏西方向,从藏南方向进入卫藏者甚少。直到60年代中期后,英国人主要是通过派遣“班智达”进入卫藏(后面专论)。

1870年春,查默尔上尉考察过唐基亚山口。1871年秋,印度地理勘测研究室的W·T·布兰福德,在伊尔威斯上尉的陪同下,沿着胡克的足迹探索了蒂斯达河河谷上游,采集了鸟类标本,研究分布在蒂斯达河上游支流地区的动物情况;他们到达了唐基亚山口,弄清了另一个从未在任何地图上标注过的山口的位置,发现了地图上没有的3个湖泊,采集了不错的鸟类标本;布兰福特还探索了通向错姆折林河谷的几个山口^⑤。1873年,安德鲁·威尔逊曾进入中国西藏札达县一带考察,并著有《雪原》一书。此外,据沈福伟的研究,1873年,埃德加考察了锡金与藏边交通;拉勒也在1875—1876年间往返于大吉岭与日喀则之间^⑥。但是,由于不具备合法性,英国人进入卫藏只能是偷偷摸摸,难以深入卫藏腹地,更别说到拉萨了。

四 “班智达”群体的考察活动

如前所述,由于在当时的情况下难以深入卫藏腹地乃至到达拉萨,19世纪60年代后,完全控制了印度并将其势力深入到锡金、不丹和尼泊尔等西藏邻邦的英国人,开始急不可耐地改变策略,即通过印度测量局训练并派遣“班智达”潜入卫藏从事大规模间谍性考察活动,掀起了卫藏考察的一轮高潮。据笔者统计,英印派出潜入卫藏考察的“班智达”人数为25人,其中第一阶段1865—1875年为12人(印度10人、波斯1人、国籍不明者1人),第二阶段1876—1884年为13人(印度10人、锡金1人、巴基斯坦2人)。

印度测量局是印度重要的工程学机构,主要负责绘制地图和测量。它成立于1767年(乾隆三十二年),目的是巩固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领土。印度测量局作为印度政府最古老的工程学部门之一,因其在威廉·兰普顿(William Lambton)和乔治·埃佛勒斯(George Everest)领导下实行大三角法测量(Great Trigonometric Survey)而在历史上赫赫有名。此后,隶属于印度测量局的皇家工程协会官员托马斯·乔治·蒙哥马利,受命对克什米尔进行勘察。

19世纪60年代,印度测量局已将中国的新疆和西藏列入测绘计划,由印度北部和克什米尔伸展到西藏。到1864年底,其对尼泊尔西部边界的勘察业已完成。然而,西藏对英国人来说却仍然是一个谜:“年复一年,西藏仍是一个地图绘制者无法涉足的地区。因而,在所有的地图上它一片空白。”1862年,蒙哥马利想出了一个极好的解决方案:“为何不精选一些聪明、足智多谋,又秘密地受过测绘技术训练的当地探险家去呢?”他的这一方案颇为“高明”:相对于西方人而言,当地人在接受特殊专门训练后,以行贩商人或虔诚朝圣者等身份伪装潜入卫藏,既能够完成各种秘密任务,又具有不易被察觉的优势。蒙哥马利吸收的第一个成员,是一名年轻的印度穆斯林穆罕默德·艾·哈迈德,此人曾受过简单的测绘训练。1863年,穆罕默德·

①米歇尔·泰勒《发现西藏》,耿昇译,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第2版,第140页。

②J. D. Hooker, “A Fourth Excursion to the Passes into Thibet by the Donkiah Lah,” *Journal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London* 20, (1850): 49-52.

③克来门茨·R·马克姆编著《叩响雪域高原的门扉》,张皓、姚乐野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第71—72页。

④周伟洲《唐代吐蕃与近代西藏史论稿》,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77页。

⑤克来门茨·R·马克姆编著《叩响雪域高原的门扉》,第82—83页。

⑥沈福伟《外国人在中国西藏的地理考察(1845—1945)》,《中国科技史料》1997年第2期,第10页。

艾·哈迈德从英国势力范围的最后基地拉达克出发,穿过喀喇昆仑山口朝着新疆的叶尔羌而去,随身携带的测量仪器都是印度测量局工厂特别设计和制造的最小规格的仪器,在叶尔羌呆了六个月后,穆罕默德·艾·哈迈德与同伴一起返回拉达克,但二人在穿越险峻的喀喇昆仑山口时,因过于饥饿劳累而染病身亡,但他们精心保存的笔记却被送到了蒙哥马利手中^①。这一成果,促使蒙哥马利及其顶头上司詹姆斯·沃克尔上校(Major J. T. Walker)开始派遣经过训练的当地人伪装进入卫藏,从事秘密的侦查和测绘活动。

在沃克尔的密切配合下,蒙哥马利着手创办了一所特殊学校(实为间谍学校),旨在训练当地的探险家从事秘密测量与情报工作。为了掩人耳目,这些探险家亦被称为“班智达”^②。他们计划让这些天资聪颖的间谍,在训练期满后,成为喜马拉雅山一侧帝国的耳目。1863年,蒙哥马利挑选了第一批学生,即两名具有英国国籍并且会讲藏语的山民,33岁的菩提亚人南·辛格和马尼·辛格,他们各自的父亲伯·辛格(Bir Singh)、德布·辛格[Devi(or Deb) Singh]曾于1812年在摩尔克罗夫特(Moorcroft)到库马洪(Kumaon)的探险中给予蒙哥马利极大帮助^③。他们在西姆拉附近的台拉登避暑地(即英国情报机构设在西姆拉的秘密训练基地)开始接受秘密训练课程。由于他们的使命是保密的,所以教授也以保密方式进行。他们的训练时间长达两年之久,训练的内容包罗万象,包括学习使用六分仪和罗盘、接受天文导航及海拔高度测量技术的训练等;他们的随身行李都有秘密夹层,衣服都有暗袋,嘛呢轮里装满了可以记录晦涩难解笔记的一卷卷白纸;他们学会了把笔记转写成韵文的技能,这样他们就可以边走边背诵经文一样地将其背诵下来;他们用念珠充当计数器,拨过一粒珠子代替旅程中多少步,他们的步子要保持不变的均匀跨度,这样就可以测量出距离;他们经受了严格的训练,以适应其行贩商人或虔诚朝圣者的身份伪装,真正的身份则隐而不露,谈到他们的时候也要使用化名,蒙哥马利通常用他们名字的两个起首字母作为他们的化名^④。此后,英印政府精心培养的这批间谍“班智达”,多次潜入西藏刺探信息。

南·辛格曾任职于位于喜马拉雅山11000英尺的米拉姆乡村学校校长,他与其堂兄马尼·辛格都是经验丰富的山地旅行者,他们曾在几年前陪同过一个普鲁士考察队(即舒拉金威特考察队)。他们在台拉登接受了两年系统训练,包括线路勘查和测绘,学会了使用六分仪、指南针、沸点测高仪和辨别星辰并利用星星来确定方位。经过反复训练后,他们无论在山上、山下和平地行走步伐都能够保持每步33英寸,用100粒的念珠串记录步数和距离,每走100步拨1颗珠子,念珠循环1遍为1万步即5英里,念珠串上的辅助细绳上的10粒小珠用于记录念珠循环的次数。他们学习了伪装术,具备了随机应变地编造令人信服谎言的本领,同时还被要求忘记自己的本名而用编号。在测绘局档案中,南·辛格为“一号班智达”(在测量局的官方文件中直接称其为“The Pandit”),其堂兄马尼·辛格为“二号班智达”(代号“G-M”)。在成书于19世纪70年代的《叩响雪域高原的门扉》一书中,为了保密,南·辛格、马尼·辛格、喀里安·辛格(Kalian Singh,又译卡连·辛格,代号“G-K”,系南·辛格的亲兄弟)^⑤分别被称为“甲学者”、“乙学者”、“丙学者”^⑥。他们装备有经过特制的嘛呢轮,内有隐秘的拉手,中空,可藏入笔记、情报和纸卷、指南针,六分仪藏在特制旅行箱的夹层里,衣服上有秘密的口袋,测高仪装在特制的棍棒中,地平仪及水银藏在一个密封的贝壳里,使用时倒在朝圣用的碗里。1865年,他们动身潜入西藏,目的地为拉萨,全程1200英里,目标为秘密打探拉萨详情并进行沿途测绘,包括从拉萨到甘托克的商路情况以及藏布江路线等,报酬为每月20卢比,成功后还能得到更多的酬金^⑦。

印度测量局专门培训的英印间谍,在卫藏考察中发挥了别人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正如《西藏探险编年

①彼得·霍普柯克《闯入世界屋脊的人》,向红笏、尹建新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0—21页。

②“班智达”(Pandita),为梵文音译,原意为博学的、智慧的大学者。

③约翰·麦格雷格《西藏探险》,第220、225页。

④梁俊艳《英国与中国西藏(1774—1904)》,兰州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89页。

⑤参见:伍昆明《伍昆明藏学论文集》,中国藏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9页。

⑥克来门茨·R·马克姆编著《叩响雪域高原的门扉》,第90—93页。

⑦彼得·霍普柯克《闯入世界屋脊的人》,第21—22页。

史》一书作者约翰·麦格雷格(John Macgregor)所说,他们“都是英国人使用的长距离探险间谍中的佼佼者。但绝不是独一无二的。印度测量局不断完善的技术与班智达们的技巧及不可思议的耐力相结合,产生了西藏高原迄今为止尚未绘制成图之荒原的大量材料”^①。这些英印间谍,不仅测绘能力强,而且具备超常耐力,能够做到不惜牺牲生命也要完成测量局交给的测量任务的“忠诚”,对英国政府可谓“忠心耿耿”。“班智达”们绘制成的西藏各地地图,成了日后英军入侵西藏的第一手参考资料。

五 英国人进入卫藏考察“独占鳌头”之成因

自古以来,西方人就对神秘的中国藏区具有强烈的好奇心,但由于各种原因,西方人进入藏区又是十分困难之事。清廷自1745—1746年在藏区禁教、1793年正式颁布实施《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直至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签订之前,外国人进入藏区活动虽然没有明确被视为非法,但遭到了当地僧俗人士的强烈抵制。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为何英国人能够在第一阶段进入卫藏考察活动中“独占鳌头”呢?笔者以为,原因主要有以下四点。

其一,经过长期经营后,英国在藏南、藏西两个方向拥有了进入卫藏的“前进基地”,并且后来采用了派遣自己培训的印度等地“班智达”潜入的办法以减小进入的阻力,并使用他们的考察成果来填补地图上的大量空白,因而具备了其他西方国家难以比拟的进入卫藏优势,进入到其他国家所难以进入的卫藏地区,达到了其他国家和其他办法难以企及的效果^②。

其二,法国进入卫藏考察的活动因法国传教士古伯察和秦噶哗于1846年被押解出藏而作罢,之后法国将努力的重点转向了徐图康区。

其三,1857年普鲁士人阿道夫·舒拉金威特在考察途中被叛乱的倭里汉处死,普鲁士人的行动因此受到打击而作罢。

其四,受制于19世纪50年代末以后新疆一带局势动荡,加上专注于俄国国内和欧洲事务,尽管英国人在卫藏的活动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俄国人的焦虑,但第一阶段俄国人进入卫藏的行动在时间和规模上皆总体落后于英国人,直到70年代以后,以普热瓦斯基等为代表的俄国探险考察家才不断从藏北方向进入卫藏,开启了俄国人在中国卫藏地区与英国势力展开实质性竞争的步伐。

总之,19世纪40至70年代,依仗在藏西、藏南两个方向拥有的前进基地,英国开启了从藏西、藏南进入卫藏考察活动的步伐,成为近代外国人进入卫藏活动中的急先锋,但因诸多因素影响,却很难进入卫藏腹地。鉴于进入卫藏极难奏功,英国转而采取了选用当地人培训成“班智达”以伪装潜入卫藏的策略,从而取得了其他国家和其他方式难以企及的成效,为日后英军侵略卫藏准备了地图、地理知识等第一手参考资料。

[责任编辑:凌兴珍]

^①约翰·麦格雷格《西藏探险》,第234页。

^②Kenneth Mason, “Kishen Singh and the Indian Explorers,” *Geographical Journal* 62, no. 6 (December 1923): 429-430.